

我的赚钱自传

邱永汉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财讯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20 号

北京版

责任编辑：臧惠娟

责任校对：李 鲜

我的赚钱自传

Wo de Zhuanqian Zizhuan

邱永汉著

合作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财讯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4号 (台北市南京东路一段52号7楼)

〔取得重印权限国内公开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 / 32 印张：4.5 字数：103 (千)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邮编：100810 电话：6022134 电报挂号：6230

翻译书店地址：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6034491

ISBN 7-5001-0212-7 / F.37

定价：3.70 元

为中文版写序

这次《我的赚钱自传》决定由朱佩兰女士翻译出版。

正如原书序文中所说，这本书是应日本著名杂志《周刊现代》的要求而执笔，是就我过去所经历的人生，从“对赚钱的想法”这角度来叙述的。我被日本大众传播界所取的绰号是“赚钱神仙”。神仙被供奉於神龛时，看起来庄严神圣，事实上把圣帘掀开时，通常只是一尊木雕而已。同样的道理，我的自传打开盖子来看时，也许是一文不值。不过，看过我这本自传的一位日本大学教授，在报纸上发表读后感说：“这是与社会上一般的印象相当不同的爱国文章。”

在日本，大家都知道我是作家、经济评论家，以及经营顾问，但称不上富翁。因此比我有钱的人很多。但回到台湾后，我在台北市中心区兴建两栋大楼，在台南县设立工业区，一共创办二十数家公司，所以被列入“大企业家”的伙伴，也被认为“传奇人物”，成为人们的话题。我周围的年轻人希望知道“今天的邱永汉先生是怎样来的？”

对我而言，被当作“传奇人物”，停留于神秘中比较好，但周围的要求拒绝不掉，终于同意出版。正如本书所述，我的人生尚未结束，还不知道今后有什么坎坷的命运等待着。然而，由于出生在台湾而尝受了出生于美国或日本的人们想

象不到的痛苦这点，无疑有许多人表示同感。若能对这些人有几分安慰与鼓励，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邱永汉

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于台北

前 言

《我的赚钱自传》这标题奇怪的文章，是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连载于《周刊现代》的。这是出于固执地相信若非取个“赚钱”的题名，读者就不看的该周刊杂志编辑的主意。

“与其要邱先生写赚钱方面的事，不如请邱先生写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反而干脆。”因此我接受了。在连载期间，由调查人们所作的投票纪录，一直保持第二名或第三名（第一名是照相版）。看来在周刊杂志的读物中，似乎意料之外的受到欢迎。

不过，这当然不是一般所说的成功故事，因为我不算是成功者，再说也尚未到可写自传的年龄。只是年龄愈来愈大时，怕脑筋会渐渐不清楚，有必要趁记忆未模糊之前作一次概要的结束，因而才执笔的。可是，从结果来说，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段落，出版社将此文作为“邱永汉自选集全十卷”的第一次发书。人到了出版选集或全集时，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段落。

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于东京

邱永汉

目 录

□为中文版写序

□前言

- | | |
|------------------|-----|
| 1 艰苦的香港受薪时代 | 1 |
| 2 月收百万元开销十万元 | 10 |
| 3 东京初期生活差一点赚十亿元 | 18 |
| 4 在贫穷中开始的不要本钱生意 | 27 |
| 5 十万元作家蜕变为百万元作家 | 36 |
| 6 借钱投资股票大赚其钱 | 45 |
| 7 从失败中体会股票赚钱秘诀 | 53 |
| 8 自创股票投资法赚大钱盖大楼 | 62 |
| 9 投资不动产的时代判断力 | 71 |
| 10 针对产业界盲点设经营顾问 | 80 |
| 11 创办时代新行业的法则 | 89 |
| 12 勿业余、勿扩大、不适者勿行 | 98 |
| 13 不景气引起大楼租赁业衰落 | 107 |
| 14 领悟赚钱与不赚钱的生意 | 116 |
| 15 曲折半生后我要说的话 | 125 |

1 艰苦的香港受薪时代

◎ 石原慎太郎获芥川奖我获直木奖

我第一次执笔撰写有关金钱的文章，是自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年元月份起至十二月份止，每月在《妇人公论》连载的《金钱读本》。

我再度回到东京时是昭和二十九（一九五四）年四月，而以《香港》这部小说获得直木奖。总算成为小说作家时是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年二月，所以是大约两年后的事。我获得直木奖时，同一天发表的芥川奖得奖人是石原慎太郎。该届直木奖得奖人两名，另一位是新田次郎。

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成为畅销书，同时也产生叫做太阳族的新名词，所以抢尽了大众传播的锋头，因此，新田次郎和我的存在显得非常渺小。为什么《太阳的季节》会成为人们的话题？因为这部小说中，有一场主人翁把男性的象征扎入纸门的描写，当时芥川奖审查委员之一的佐藤春夫先生指摘它缺乏美的标准，而激烈反对石原君得奖。但读者的心理都是名家反对愈激烈，则愈想一睹为快。我也不例外，赶紧阅读。但事实上那纸门的场面不过是一点点，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整个文章虽然难免有些生硬的感觉，但

洋溢着年轻人的精力充沛。我的印象是：“不错，这里有年轻人的解放方式，也许诸位审查委员就是被石原君这种热情所感动的。”

当时石原君仍在一桥大学念四年级，是一位高高瘦瘦的白面书生，自此以后不仅一炮而红，并且连他的弟弟石原裕次郎也一起出名，成为一对极负名气的兄弟。内人看到石原君的成名方式，佩服地说：“两个儿子都这么出名，做母亲的一定很高兴。哥哥照顾弟弟，弟弟也帮忙哥哥，乍看之下是很平常的事，但事实上是难得的美谈。”大家都知道其后数年来一直受欢迎的作家，生活多彩多姿的石原君，也许厌倦了作家的生活，立志做政治家，创下三百万票的史上最高得票记录，当选参议员，成为政界人物。

另一方面，我从文学转向经济，若按照大众传播的称呼，我成为“赚钱的神仙”，但契机是在写了《金钱读本》。以日本文字写小说的人获得日本的文学奖，想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得到直木奖，对于朝鲜和台湾爱好文章的青年来说，是颇为惊讶的事。因为不是日本国籍而获得日本文学奖的人，我是第一个。

在我之后，现在已经有陈舜臣以《青玉狮子香炉》获得直木奖，也有朝鲜青年作家屡屡成为芥川奖的候选人。不过，在我之前有几位略有名气的朝鲜人作家和台湾人作家，出版了数册以日文写的小说，但奇怪的是都与文学奖无缘。我不认为艺术家具有种族上和民族上的偏见，而且我本身对这种事很迟钝，认为得不到文学奖，是由于实力不够，或运气不好，必是这两者之一，所以只要有志于文学，得奖应该不会太困难。但大多数的朝鲜人和台湾人体验过五十年之久

的殖民地差别待遇，偏见比较深，认为他们得不到奖，是因为在文学的领域，也同样受到民族上的偏见所支配。

我在台北高校时代和东大经济学部时代，也受到糊涂教师的这种待遇。但由于学校的成绩从不输别人，所以通常富于人情味的教师都很亲切地指导我，绝不亏待我。因此，对这个问题一直抱着乐观的看法。

由于这样，我在写怎样的小说才会得到诸位审查委员的票这方面，费了脑筋，但从不曾想到三个字的姓名在得分方面受到苛待。而且正如我所想的，我得了奖，只是事实上问题是出在其后。

◎ 经商的动机

把话说回头，我是昭和二十（一九四五）年九月毕业于东大经济学部，正好是战争结束那一年。当时我打算将来做大学教授，所以直接进入大学院。由于是长期的言论管制解除之后，学园也开始发生学生运动。于是，数年前才在美国旅行中逝去的法政大学经济教授薄信一君，他是我在大学院的同学，以我们两人为中心，组织“东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竟有约二百名血气方刚的学生参加。

现在回想，那是很温和的学生运动。大学当局说，要集体活动时，必需有指导教官，因此就请求当时的经济学部副教授大河内一男氏，担任名义上的指导教官。然而，聚会的学生都是在战争期间躲着人们偷偷阅读“资本论”之类的青年，除了我和薄君以外，都是马克思青年。

因此，多数意见主张大家聚合开讨论会，或举办读书

会。但薄君和我的意思是，“难得集合这么多的人，不如做一些没有一大群人就办不到，而且能够留下成果的工作”，因而提议调查在烧后的废墟临时搭建木板屋居住的空袭受害者的实际情况，以及舆论调查。这项提议虽然被接受，但原有的二百名会员一下子仅剩一成而已。

但由留下的这三十余名，分别在东京都内三十六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由我整理这些调查报告，利用当时只有半张大的大学新闻整个版面，写了一篇题为“壕舍生活者实况及舆论调查”的论文。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进行的实态调查和舆论调查，是非常新奇的计划，所以当我们把资料送到报社后，三大报都刊登了这项消息。

次年二月，由于载送复员者和返回日本者的船要开往台湾，我决定回故乡而离开了东京。是否会再度踏上日本的土地，我感到怀疑。因为当时是日本蒙受严重的灾害，而且是进驻的盟军占领统治之下，认为要复兴恐怕需要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时代。后来虽然我被列为对今天的日本经济有先见之明者之一，但没有想到八年后我又回到东京，更是做梦也想不到成为作家，靠写作吃饭。

要返回台湾时，我认为“台湾已经从殖民地统治下解放了”，所以很高兴能够“建造我们自己的新天地”。但事实上从大陆来了一批比日本时代更恶劣腐败的官吏。国民政府所派遣的陈仪手下一批人，是史上罕见的无耻贪污官吏。关于当时台湾的情况，我在《偷渡者的手记》中有详细的叙述，这里节省不提，但反正对于一个抱着纯真情怀的青年人来说，那是不忍正视的现实，因此，我放弃做大学教授这条路，决定选择纪国屋文左卫门（注：德川时代富商，于十八

岁时因海浪汹涌，船运断绝，他即募征一批船员，冒生命之险，将纪州柑桔运往江户，供新年之需，因而发大财)的生活方式。

◎ 私运砂糖失败

当时物资缺乏的日本本土与外地的交通断绝，粮食不足的情形十分严重，尤其砂糖是属于贵重物品。另一方面砂糖产地的台湾虽然大量生产砂糖，但由于空袭和潜水艇的攻击，无法运出海外，学校的室内体育场被用来做为储存砂糖的仓库，出现一斤砂糖比一斤青菜便宜的怪现象。利用渔船载这些砂糖，运到门司或神户，便能以十倍的价格出售。

台湾的船禁止到日本，用渔船载运砂糖也不能公开进行。但事先把砂糖运到海边的小渔村，趁黑夜搬到渔船上，假装渔船出港捕鱼的样子并非不可能。凡是赚钱的工作必有先觉者，偷偷用渔船装运砂糖到日本出售而发财的，不乏其人。这些人现在都成为了了不起的实业家，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相反的，由于不忘当时所尝的甜头，在恢复正常社会后仍干相同的勾当，因而没落的人也很多。

我曾听说在仅仅八吨的小渔船上，竟装载一百包砂糖，以至于船员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们躺在船舷眺望夜空，说“好美的月亮”而将手放下时，就触到了海水。如此超载，要是遇到台风，必然立刻翻船，若下了雨，砂糖也会淋湿融化。然而，我一位朋友的哥哥他们一群人就是如此来往于日本和台湾之间，过着豪华的生活。

我也受到诱人伙，说服父亲拿出一些钱，买了砂糖到

新竹海边的渔村。但渔船到达时，在半夜里点着火把，开始装载砂糖时，突然浪涛大起，使得渔船搁浅。虽然直至清晨拚命努力使船开动，但船已损毁。天渐亮后，这些偷渡者全部跑掉，而昨夜以前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却留下一艘渔船的残骸。

相同的失败反复了三次，所以我变成穷光蛋。后来因为写作而稍有名气时，有一次参加母校的东大经济学部同学会，被邀演说。从前教我深奥难懂的经济学理论的老师坐在台下的椅子上，我则上台说话。我在各位老师面前说：“我很感谢在优秀的大学让诸位老师教授高尚的经济理论，但毕业回国后，流浪于香港时，我觉得处处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授如何赚钱。”

听我这么说，诸位老师不由得露出了苦笑。战后经济学的老师也不例外，以微薄的薪水；过着拍买衣服度日的生活，但没有人写出“竹笋生活的经济学”（注：以一层层剥下笋壳譬喻拍买衣服度日的生活。）也没有人预言日本经济会像脱壳的竹一样成长迅速。相反地，对日本经济在资本主义下的成长抱着否定看法的人比较多，所以岂有心情教授初步的赚钱方法？何况是以八吨的小渔船装载砂糖，渡过被禁的东中国海该如何做才好的应用经济学，学校并没有教授，所以我要做纪国文左卫门的梦也就粉碎了。

于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为了生活，我找到银行的工作。当时正巧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政治家，他接收了日本人的商业银行，担任董事长，新设经济研究室。这研究室的主任是我在东大的学长，就是这位学长帮忙我谋到这的职位的。开头六个月是以研究员要的身份上班，后六个月的

职位是调查课长。这一年期间，就是我半生来唯一的受薪时代。

◎ 艰苦的香港生活

我虽然过着受薪的生活，但对于当时在陈仪那批贪污官吏的执行下，每天发生的事感到无法容忍的愤慨。当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平息后，我向银行请假，说要回故乡相亲而到香港去，从香港向联合国寄出“台湾实施国民投票”的请愿书，然后回台湾来。但这请愿书透过美联社与合众社，传播于世界各地。因此，台湾也不能忽视。有一天，我在银行翻开报纸来看，看到一则很大的标题“台湾人为黄帝子孙，绝非混血儿”，刊登台湾省议会议长黄朝琴的反驳文章。

于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设法筹到钱，搭机飞往香港。

其后六年之间，我一直在香港生活。语言不通，学历也派不上用场。没有朋友，找不到工作，又没有钱。我好像难民一样，寄人篱下，为赚取一点零用钱而以拙劣的英文写稿投寄英国人经办的《远东经济评论》，或替走私到香港的人做向导等渡过了一年。然而，把大学所学的一切经济理论全部抛弃，从“赚钱学校”的小学生重新做起。由于这样，很幸运的是从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二十七岁时，我就有了两千万的财产。这并不是现在的两千万，而是东京每坪四十万元至五十万元的土地，是通常每坪一千元就买得到的时代之二千万元。

◎ 以侵占百万美元的故事获奖

以我当时在香港的见闻与体验而写成的得奖小说《香港》，是描写一个难民厌倦了穷苦的贫民生活，企图欺骗，把预备运往卡萨布兰加的茶叶里面装入石子，侵占一百万美元而逃往日本的故事。如果是现在，这故事一点不新鲜。记得数年前，报纸上也报道过，输往美国的电晶体收音机箱内，装有石子的事件发生。想到这件事也许是从我的小说得到的暗示，就忍不住苦笑。不过，在昭和三十（一九五五）年时，尚没有人写这种方式的小说。因此，才得到八位评审委员中的五位投赞成票，使我获得了直木奖。

首先以电话告诉我此消息的人，是很早就赏识我的檀一雄先生。接着，文艺春秋社也拍电报来通知我获奖，马上去一趟。翌日，我到文艺春秋社，编辑主任池岛信平一看见我就问：“那部小说真有趣，小说中的主角是你自己吗？”

因为故事是骗了一百万美元后逃到日本，所以难怪他这么想。但我回答：“不，可惜不是我自己的故事，假如我有骗取一百万美元的勇气和机智，我也不会做写小说这种穷酸的工作了。”

从我开始写小说到被提名，这当中是一年，第二年就马上得奖。虽然没有石原君和大江健三郎君（注：一九五八年以《饲养》获芥川奖）那么快，但已经可以说相当幸运了。尤其是直木奖多半颁赠年龄较大的作者，而我是在十五年前得奖（即一九五三年），比今东光（注：一九五六年以《阿吟》获直木奖的和尚作家，一九七六年逝世），司马辽太郎

(注：以《梟之城》获直木奖)，及水上勉（注：一九六一年以《雁寺》获直木奖）等人为早，所以被误以为年龄相当大。但事实上头发虽然有些稀薄，却刚满四十七岁而已。（指一九七一年时而言）。

2 月收百万元开销十万元

◎ 为女治痣迁居日本

当我获得直木奖时，由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奖，因此中央通讯社东京特派员报道：“国人荣获日本著名的文学奖”。

这位记者只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没有看到我的小说内容，所以当然这样报道。因此，台湾的报纸也刊出我的消息。但后来据说看了小说后，发现有许多地方批评政府，使得这位特派员丢了差事。

仅写过四、五篇小说就获得直木奖，这是我的幸运，但我并不是爱好文学的青年。爬格子的工作若不是爱好是做不来的，我在高校念书的时候就单独办过文艺杂志，所以也时常写诗歌、小说等。但出生于殖民地，属于被支配者这边的青年，不可能靠一枝笔生活，所以我没有进入文学部而选择了经济部。

假使战争没有发生，也许我会在上海一带的商社任职，选择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可是，既然我无意重返东京，并且从事写作，为什么会成为作家？原因是在香港结婚，第一胎出生的女儿颈项长着红痣，为了治疗它，不得不在东京逗

留一年。

◎ 学习船员赚大钱

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段时期我非常贫穷。但大约一年后我就习惯了当地的生活，第二年即开始慢慢赚钱。没有钱，语言又不通的人，在香港流浪，怎会赚钱呢？因为我寄居的家里，有一天来了一位住在日本的台湾人。

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年）是几乎不能出国到海外的时代，但这人却搭船来到香港。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给一艘货轮的船长一万元，以船员身份而来的。

“你为什么要付那么高的代价来到香港？”我问他。

“老实说，我是来买盘尼西林和链霉素以及糖精的。”

“嘿，这些东西也可以做生意？”

“当然可以，五倍、十倍的价钱都卖得出去。”

香港是国际港，战争甫结束，世界各地的物资汇于此，然后再以走私的形式，或其他方式再运往限制进口严格的东南亚以及日本。盘尼西林在香港每瓶约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日本则要一万元。

从台湾运砂糖到九州 的船是八吨至一百吨的小型渔船，而香港的人们所利用的，则是数千吨到万吨级的大铁船。这么大的船自然不必担心翻覆，只是它公然停泊于码头，所以装货卸货都需要特别的技巧。原来他们是把盘尼西林或链霉素等满装在汽油罐内密封起来，上面盖着橡胶袋。抵达日本时，万一美国宪兵的监视太严，不能在港口卸货时，就利用舢板，划近相反方向的船舷，偷偷卸货。据说，这是为使短